

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分析

张一飞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北京 100037)

摘要: 随着中国周边外交越来越深入地走向海洋, 中国需要明确承载其海洋战略研究的具体概念与核心问题。“中国周边海洋外交”是中国周边外交在海洋方向的投射, 作为中观概念, 它连接了微观的海洋主权维护与宏观的和平发展。在开展“中国周边海洋外交”过程中, 中国必须直面三大海洋枷锁, 即中国近海冲突国家、美国单边海洋秩序以及中国固有海洋记忆。中国可以按照逻辑顺序, 通过去认知错觉、去极端选项与去机制盲区等对应方式实现“解锁”, 为自身的海洋主权维护与和平发展创造条件。

关键词: 中国; 海洋主权; 周边海洋外交; 枷锁; 解锁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26(2017)02-0013-07

一、现阶段中国海洋战略的核心问题及其对应承载概念

在某个战略方向形势的变化中, 一国需要不断明确与新生问题相对应的新生概念作为其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新载体。以美国的海洋战略为例: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 美国海洋战略的新问题是“如何将美国在美洲的影响扩展到世界”, 其战略制定以马汉提出的“海权”概念为依托; 冷战期间, 美国海洋战略的新问题是“如何遏制苏联在全球海洋空间的扩张”, 其战略制定以小约翰·莱曼的“威慑-前沿防御-盟国团结”等概念为依托; 冷战结束至今, 美国海洋战略的新问题是“如何防止新的海洋强国威胁美国霸主地位”, 其战略制定以“海上安全”概念为依托。^[1] 观察可见, 美国在海洋战略方向面对的新生问题与其提出的承载概念动态匹配, 这是美国最终成长为全球海洋“商业-军事”霸主的战略成功经验。问题的概念载体必须与时俱进, 与问题相得益彰; 滞后于问题的概念载体将使国家在该方向的战略制定陈旧保守, 而提前于问题的概念载体将使国家在该方向的战略制定大而无当。

中国的海洋战略正处于形成阶段, 其战略制定的起点应是现阶段中国海洋战略的核心问题。对

此, 当下有两种极端观点可能会给提出中国海洋战略核心问题的承载概念造成困扰: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海洋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制定全球海洋战略使中国成为全球性海洋大国”, 甚至是“如何使中国与美国在海洋军事影响力上平起平坐”。笔者认为, 这一核心问题过于激进, 原因有四: 第一, 中国不具备美国所特有的“东西两大洋, 南北无强敌”的地缘优势, 海洋力量的发展背负有沉重的地缘政治负担。第二, 中国与美国在综合国力上尚有实质性差距, 中国的经济实力转化为海洋军事实力更需时日。第三, 中国没有海外军事基地或殖民地使中国产生制定全球海洋战略的战略冲动和现实依托。第四, 现阶段中国的宏观对外战略是和平发展, 中国制定全球海洋战略的配套战略尚未形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中国海洋战略的核心问题是“海洋是否应该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 甚至是“中国是否应该走上纯陆权大国道路”。笔者认为, 这一核心问题过于保守, 原因有二: 第一, 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正在稳步推进, 与周边国家在经贸、金融、能源、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正在向海洋方向逐步展开。第二, 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全球性大国, 在海陆兼备的条件下, 走向海洋是对战略空间、战略互动、战略潜力等因素综合考量后的必然结果。在既反保守又反冒

收稿日期: 2017-04-13; 收修改稿日期: 2017-05-19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究”(项目编号: 15JZD03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一飞(1988-), 男, 河南开封人,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安全与大国战略。



进的原则下,十八大报告在第八部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明确提出,我国应“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中国的未来战略方向是富有远见和魄力的,而把“建设海洋强国”这一落脚点建立在“由维护到建设”“由经济到政治”的稳健基础之上,也显然是更加符合中国现实条件的。

从战略层级的角度来看,无论未来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具体内容为何,其实现必然基于两个前提:第一,中国近海地区保持安全与稳定,海洋主权得以维护。第二,周边外交战略与中国多边外交及和平发展的宏观对外战略相匹配。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海洋战略方向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维护周边海洋主权,并为中国周边外交,乃至多边外交与和平发展的整体对外战略提供海上大后方”。承载这一问题的核心概念,即为“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它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在海洋方向的投射。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是由“西方现实”与“中国理想”共同塑造的:一方面,它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绝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层面的“底线思维”^[3],表现为中国努力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努力建设巩固和强大军队(主要防御和可能作战范围是周边地区)^[4];另一方面,它追求感情基础与合作共赢,表现为突出“亲诚惠容”等周边外交方针,全力维护和平发展,使中国发展与周边发展统筹合一(如“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开发主张)。“中国周边海洋外交”作为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在海洋战略方向的反映可以被定义为:在中国周边海洋范围内,以维护国家安全与实现海上利益为目的,以做好防范与促进共赢为主要实现方式的海洋战略思想与行为的总和。

二、维护中国海洋主权的三大“枷锁”

排除“全球性海洋战略”“纯陆权战略”两个极端选项后,现阶段中国海洋战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维护中国海洋主权,并为中国周边外交,乃至多边外交与和平发展的整体对外战略提供海上大后方”,其对应的新生概念是“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尽管这一概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但可以确定的是,其发展方向必然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相契合,在现阶段必然以维护中国海洋主权为基本目标。这“两个必然”为现阶段“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奠定了基调和方向。只有从“中国周边海洋外交”这一中观层面反观中国海洋主权维护这一微观问题,才可以跳出两国关系、国际法、军事力

量等“就事论事”的藩篱,真正发现中国海洋主权维护中由浅而深的三大“枷锁”。

(一)外在有形枷锁

第一道枷锁是与中国切实发生海洋主权冲突的周边国家。从这些国家的分布来看,基本遍布中国沿海所有海域,由北向南依次为:黄海海域——韩国占据苏岩岛并在岛上建立军事设施,两国对黄海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亦存在分歧;东海海域——中日之间的传统海洋冲突并无缓解,钓鱼岛争端、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仍处于对峙僵持状态;南海海域——“从岛屿领土主权争端的角度看,涉及五国六方(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地区),从海域划界争端的角度看,涉及六国七方,即除了上述五国六方外,印度尼西亚也对南沙群岛西南侧的部分海域主张管辖权”。^[5]其中以南海海域形势最为严峻复杂:“中国在南沙群岛控制的几个岛礁,除台湾当局据有最大的太平岛外,其他均低于高潮线。在南沙群岛中,越南占据最多(30个),其次是菲律宾(8个)和马来西亚(5个)。这些国家分别对所占领的岛礁进行填高和加固,进行无线电通讯设备和机场等项目建设,以期造成既成事实,达到永久占领的目的。”^[5]

这些国家在“中国周边海洋外交”中对中国海洋主权造成了即时的、显著的、事实的破坏,可称之为“外在有形枷锁”。“外在有形枷锁”对中国海洋主权的破坏有可能锁住“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战略自洽性。美国“9·11”事件以来,中国抓住了15年的战略机遇期,在实现政府体制改革、经济总量提升、社会结构转型、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都上了一个台阶。随着国家实力发生质的飞跃,“中国周边海洋外交”这一新概念伴随新问题产生,而“外在有形枷锁”的存在使“中国周边海洋外交”这一概念初生之际便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已经是万众瞩目的世界焦点,且战略方向已经对准海洋,不论从国家尊严还是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看,“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必须以维护海洋主权为基本目标,很难对海洋主权冲突继续“搁置争议”;另一方面,中国进入和平崛起的关键阶段,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安全与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必须以和平发展为基本前提,与周边国家的冲突群体性升级对中国的周边海洋外交乃至和平崛起将是重大打击。中国继续忍耐则“海洋主权”受损,放弃忍耐则“海洋和平”受害,而“主权”与“和平”任何一方遇难,中国都将面临周边海洋外交胎死腹中,甚至提前结束和平崛起战略机遇期的巨大





风险。“外在有形枷锁”对“中国周边海洋外交”两大前提的战略自洽性提出了挑战。而在现阶段,“除了宏观性原则陈述外,极少从中国官方权威处得到详细的中国周边外交方案以及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海洋行动方案”。^[6]

(二)外在无形枷锁

第二道枷锁是美国塑造的以其单边利益为导向的海洋秩序。作为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国,美国持续试图对《公约》所形成的海洋利益分配进行改造与重塑。美国的海军力量超过世界其他海军力量的总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为实现与其海洋实力相匹配的海洋利益(且同时摆脱与其海洋实力相匹配的海洋义务),始终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坚持“对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美国一直持一种宽泛的解释,而且使用了‘国际水域’这个用法来统称公海、专属经济区和毗连区”。^[7]这种“航行自由”主张的实质是美国为发挥其海军“防范美国竞争对手”“维护美国海外利益”“强制实现美国战略意图”等作用,减少既成海洋秩序的束缚与阻碍。尤其是“美国把专属经济区定位于国际水域,进而主张专属经济区内所有与资源无关的公海活动都不应受到专属经济区制度的限制,这些活动包括特种部队部署、飞行活动、军事演习、通讯与空间活动、情报收集和侦查活动、海洋数据收集、武器测试和开火”。^[7]反之,其他国家在事实上没有能力和意愿在美国近海实现类似行动,这种单边主义主张对中国海洋安全构成直接挑战。

这一充满霸权主义色彩的单边获利秩序在“中国周边海洋外交”中对中国海洋主权形成了根本的、隐性的、潜在的威胁,可称之为“外在无形枷锁”。“外在无形枷锁”对中国海洋主权的威胁有可能锁住“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战略规范性。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需要一个公正、合理、法制、稳定的国际海洋环境,使和平发展战略的实现获得一个健康、和谐、规范的政治军事生态。尽管在南海撞机事件、无暇号事件中,中国都理性对待了美国的非法进入与骚扰,使事件没有扩大为两国直接军事冲突,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迟滞美国塑造的单边海洋秩序的步伐,而在《公约》与“航行自由”两种海洋秩序的并存和对抗中,《公约》缔约国在预防、制裁与话语权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目前,“外在无形枷锁”与“外在有形枷锁”出现合流之势,美国试图通过双边协定进一步挑战《公约》秩序,尤其在西太平洋地区,即中国周边海洋地区,对中国远洋作战能力的提高与对海外利益的合法维

护抱有极大警惕与敌意,给中国海洋战略的实现平添了巨大的随机性风险。

从战略文化的角度说,美国战略文化的三大支点是:普世价值的利益观,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冲突斗争的方法论。首先,受到一神论宗教信仰的影响,美国的战略思维中的领导地位和利益维护不可分割。“使美国的价值和制度普世化”是美国战略思维的心理基础和主要战略目标。由于美国自视代表了上帝意志与正义方向,因此在其看来,“使其他国家沿着美国模式发展,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有助于世界文明的进步;反之,如果其他国家拒绝接受这种安排,就不仅有损美国利益,对全人类的利益也是一种威胁”。^[8]美国对外宣称的“主权有限论”(在海洋方向为海洋权利有限论)等观念都是其普世价值利益观的表现。其次,受西方哲学二分法的影响,美国的战略思维中世界是二元对立的。二分法是西方分析性哲学思维的典型代表,强调个体之间的分离性、差异性和对立性,“对于西方思维方式具有代表意义的非矛盾定理表明,A不可能是非A;反之亦然,每一个物体都是分离、独立的,A具有自身的本质属性,而非A也具有A不具备的本质属性”。^[9]有差异的双方既不能相互转化,也不能最终调和。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美国的战略思维中尤其明显。对于不符合美国模式的国家,美国抱有天然的敌对态度,在具体问题上的合作方案并没有取代其根本性敌对至少是警惕心理。最后,基于二分法的世界观,冲突辩证法衍生出的方法论体系自然成为美国的战略准则。前两个支点勾勒的战略前景使美国认为自己处于一个自身代表正义而冲突无法调和的国际关系世界,面对与自身模式和价值不同的文明或国家,战略意义上的斗争就成了解决其认知失衡和利益威胁的唯一途径。“不同”即“不和”,“不和”即“必斗”,这一逻辑链条反映在战略方法论上,就是制造或扩大危机,直到把“不同”改造为可以“和”的“相同”,或者将“不同”的载体消灭。

从战略文化具体到美国的亚太战略,其核心思想是防止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目前最有潜力的是中国)在太平洋西岸(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超过美国。“丢失亚洲意味着美国退守为地区国家,因此,防止美国丢失亚洲应该说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底线”。^[10]一旦出现“中国与周边国家大战略利益趋同”“中国远洋航行作战能力有所提高”或者“中国战略抱负突破东亚”等有可能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主导地位的战略发展趋势,在其战略文化的催动下,美国都会本能地利用其占有绝对优势的军事运载力、机制控制力以及话语塑造力对中





国加以平衡,以求恢复旧有秩序。美国不惜损伤国际声誉而全力维护的单边海洋秩序,是其特有战略文化通过亚太战略体现于海洋方向的产物。对于中国来说,与美国“不同”被解读为与美国“必斗”,于是,“睦邻友好”被解读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大战略利益相同”,“保护海外利益和近海主权”被解读为“中国远洋航行作战能力有所提高”,“开展‘一带一路’战略”被解读为“中国战略抱负突破东亚”。因此,在美国单边主导的海洋秩序下,体量巨大、发展迅猛的中国自然成为其在西太平洋地区首当其冲的战略对象,这更需要中国发挥前所未有的多元智慧才能切实维护合法海洋秩序,实现和平崛起。

(三)内在枷锁

第三道枷锁是中国固有的关于海洋外交的记忆路径。中国历史上的海洋外交记忆包括两类:第一类是在清朝中期之前,海外国家主动依附的历史记忆。在这类记忆中,中国的海洋外交以儒家理念为主导思想,即以仁义的道德力量保证内部稳定与外部和平,反对使用暴力追求对内部稳定有害的外在目标(任何进取性外在目标的设立都将面对强大的文化与法理压力),以文化为吸引、以经济为纽带,形成外部主动归附的和谐秩序。第二类是在清朝中后期以后,海外国家强力入侵的历史记忆。在这类记忆中,中国的海洋外交以防御与学习为主导思想。一方面,海外文明对中华文明的生存形成威胁,不论是心理上还是政治上,中国都处于防御状态;另一方面,儒家的文化优势迅速崩塌,中国为求自强,在经历了恐惧、愤怒、痛苦等情绪之后,开始全方位向西方学习。这两种海洋外交记忆使中国对于“我强于人”及“人强于我”两种外交情形皆有经验可循,但现阶段实际情况是:“我强于人(外在有形枷锁)”而“人”不“归附”,“人强于我(外在无形枷锁)”而“我”难“学习”,中国既不能以文化引力恢复对周边小国的旧有秩序,又不能学习美国建立属于自己的亚太同盟体系。“强大中国的海洋主权遭到破坏和威胁”这一新情况超出了中国所有海洋外交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开展周边海洋外交以维护海洋主权形成了巨大的理解障碍和心理压力。

固有的海洋外交记忆在“中国周边海洋外交”中对海洋主权的维护造成了认知的、心理的、情感的障碍,可称之为“内在枷锁”。“内在枷锁”对中国海洋主权维护的阻碍有可能锁住“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战略创造性。就第一种历史记忆而言,“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道’的价值本身就是目标,而‘利’也好,‘功’也好,都是次要的、无足

轻重的”。^[11]儒家外交“问义而不问利”的价值取向本身就给实际问题的解决带来了道德负担和战略限制,“道德既是工具也是目的”,这样的外交方案明显不符合主权民族国家林立的现实情况。然而,中华民族是重视历史的民族,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第一种历史记忆将至少局部复苏,在经验重构和实践探索明朗化之前的战略形成期,第一种历史记忆甚至有可能在战略惰性和惯性的驱使下重新占据上风,使中国陷入儒家“以德服人”等自我对话的认知错觉中,而缺乏直面现实并创造性解决新问题的清醒认识。

中国的国际政治传统与西方现实主义传统存在很大差别。尤其是肯尼斯·华尔兹开创的新现实主义传统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功能同质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区别仅为实力大小。因此,为满足首要的安全需求,国际关系的最佳状态是实力平衡,国家应追求适当的权力,以避免他国结盟(权力过大)或任人摆布(权力过小)。但是,在历史上的东亚范围内,中国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认知却与之迥然不同:国际社会处于等级结构中(中国为中心国家);国家是角色不同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区别是关系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区别(越接近中心越有利于发展)。因此,对于中心国家来说,安全需求并非唯一追求,甚至不是主要追求,中心国家要追求更好的体系关系来维持对自身中心道德文明地位的认知平衡和价值满足,关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只不过关系的维系在客观上对于维护中心国家的安全与合法性有所助益。中心国家要通过实践道德规范赢得尊重,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心国家追求减少体系冲突,寻求情感性联系,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满足感,从心理角度讲,“服”比“畏”更接近中心国家的战略目标。直到19世纪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开始主动融入“华尔兹体系”,而直到19世纪90年代(甲午中日战争)“中华体系”彻底崩溃之后,中国才完全成为“华尔兹体系”中的一员,但是历史记忆所保有的道德手段论和关系目的论仍有很大的心理惯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在主权林立的“华尔兹体系”中以工具理性维护自身利益造成了情感障碍。

三、维护中国海洋主权的“解锁”方案分析

“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的展开与延伸是一个与海洋主权维护枷锁斗争的“解锁”过程。针对中国海洋主权由内而外的不同枷锁,通过“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实现的“解锁”方案可分为三个环节,完成



这三个环节的同时,中国海洋主权维护这一基本目标也将得以实现。

(一) 去认知错觉

所谓“去认知错觉”是指排除“厚往薄来”“仁者无敌”“征远来近”等东亚封贡体系下海洋外交的固有记忆干扰,杜绝儒家战略思想中的道德外交倾向,不将实现“多予少取”“锄强扶弱”等道德价值本身作为全部或根本性外交目的,主要针对内在枷锁。

第一,明确外交目标,坚持结果导向。“中国周边海洋外交”现阶段的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海洋主权,“只有以实际行动坚决有效地维护、捍卫好自身主权、合法权益及国际权力和权威,才能用强有力的手段和坚定的意志、信心更好地维护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12]因此,中国应从根本上放弃“仅仅以道德感化便能解决主权问题”的认知错觉。“中国周边海洋外交”是比中国周边外交更加微观的外交层次,其指导理念中的工具理性成分应超越价值理性成分,而不把实现某种道德价值本身作为最终目标。

第二,明辨周边现实,坚持因人制宜。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重心仍以大国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在潜意识中把菲律宾、越南等小国的外交政策与美国战略彻底捆绑。不可否认,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海洋战略、外交政策影响颇大,但美国毕竟不是西太平洋国家,中国需要进一步充分发挥地利之便。对周边小国情感上的陌生感也给陈旧历史记忆复苏提供了条件,由于依赖历史记忆,中国更有可能倾向于道德化外交。只有对周边海洋冲突国家进行细致了解、真实认知,才能排除历史记忆干扰,实现差异化外交,为针对具体国家的战略战术制定提供空间,为维护海洋主权、开展周边海洋外交提供保障。这也是后两个解锁方案的心理基础。

(二) 去极端选项

所谓“去极端选项”是指不把某种特定战和关系或阶段性事件作为对某国关系的定性结论,保持冷静而开放的心态,将关系发展过程化、动态化,积量变为质变,主要针对外在有形枷锁。

第一,策略多样化,不在极端选项中做选择。“外在有形枷锁”给“中国周边海洋外交”造成的两难困境的前提是中国必须在短时间内选择最终的战和状态。而事实上,在“选择主权而放弃和平”与“选择和平而放弃主权”这两个极端选项之间,有极广阔的外交策略施展空间。比如,在软硬兼施的前提下,以共同开发中的让利换取海洋主权的归属;在恩威并用的思路下,以满足多数相关国家的

利益诉求来全力孤立某极端敌对国家,迫其就范,形成示范作用;在兵贵神速的原则下,以雷霆手段在某一点处迅速造成有利于我的既成事实而后寻求外交妥协;在远交近攻的策略下,以与大国进行利益交换的方式尽快使中国近海大后方的建设成为现实等。和平的实现是一个过程,而非确定结果,必须常备不懈地持续维护,而非寄希望于获取某种权力或实现某一目标后和平即可永驻。“中国周边海洋外交”要具备策略思维,将舍小求大、以点带面、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等策略作为和平前提下维护中国海洋主权的利器。

第二,威慑具体化,不在困窘境地中求可信。“尽管中国与邻友好的长远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便已成形,但中国尚未出台系统化针对海洋问题的解决方案。”^[13]而在国际政治中,越是美好理念越需要现实支撑。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需要以“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形成具体威慑战略作为支撑。在1996年台海危机中,中国通过军事演习与导弹试射等方式展示了高超的威慑战略水准,美国在其后来五年内的对台交往中没有出现明显挑衅行为。但在海洋主权维护方面,中国战略威慑的可信度在一系列事件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在强调美好理念的同时,似乎并未将威慑方案明确化、具体化、公开化,以致于伤害了战略威慑的可信度。即,一方面给中国外交斡旋争取了缓和空间,但另一方面也使某些国家得寸进尺,使中国维护海洋主权的形势愈发严峻。只有中国海洋主权得到维护,中国才能够进一步开展“中国周边海洋外交”,进而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正落实于和平崛起进程之中。和平与威慑并非矛盾体,而是“连体婴”,威慑并非威胁,而是通过展示实力、明确底线,划定冲突范围。这对争端的有限化、底线化解决与和平的维护有利而无害。“中国周边海洋外交”不仅要展示中国谋求和平的诚意,也要展示中国维护和平的能力与决心。

(三) 去机制盲区

所谓去机制盲区是指通过使用话语权,提出自身海洋秩序主张,并争取国际支持,维护一个以和平、有序、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和模式的多边而非单边海洋秩序,主要针对外在无形枷锁。

第一,在海洋话题中积极使用话语权。“国际话语权主要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社会发展事务和国家发展事务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这些事务是与国际环境密切相连的,并体现了知情、表达和参与权利的综合运用”。^[14]多年来,中国在提高话语权方面有了长足进步,但权力的获取和权力的使用

是两种能力,在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力之后,更重要的是为影响力填补内容,而良好的内容又将反过来促进话语权的进一步增加。具体到周边海洋外交,中国要维护周边海上的公正秩序以保障本国利益与邻国利益在和平环境中得到合法维护,则必须一方面在现有《公约》秩序遭到破坏时挺身而出,及时抵制,这与前文提到的“威慑具体化”一脉相承;但更根本的是另一方面,要发现现存秩序在维持成本与增益功能等方面的不足,比如,针对违反或破坏《公约》秩序的《公约》缔约国与非缔约国是否以及如何分别对待。

笔者认为,由于《公约》对缔约国与非缔约国的约束力不同,针对违反或破坏《公约》秩序的缔约国与非缔约国必须区别对待。是否缔约本身,已经体现了一国对《公约》秩序的认可程度。美国在国际场合经常援引《公约》内容,这说明它在某些方面认可《公约》秩序,因此,如何区别对待的关键就在于美国不认可的方面。美国不认可的方面主要集中于平等的海洋秩序,因为平等的海洋秩序使美国强大的海上实力难以发挥,不能享受“特权”。因此,对于缔约国,除了《公约》中规定的违约惩罚之外,还可以通过在不同的国际场合显示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公约》的决心,使违反《公约》的缔约国声誉成本趋于无限上升;对于非缔约国,则必须团结缔约国,在舆论、民意、利益方面协调一致,使非缔约国破坏《公约》秩序的政治、外交、经济成本持续上升。

第二,在海洋外交中积极发起共赢合作。要团结《公约》缔约国与非缔约国从被动的“遵守和中立”到主动的“维护与建设”,最根本之处在于要使相关国家在《公约》秩序中基本都能不同程度地维护和扩大本国利益。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在周边海洋外交中要有意识地为现有《公约》机制赋予新的功能,完成该机制由“分配利益”到“创造利益”、由“简单维持”到“动态升级”的转变,使《公约》秩序从高纬度超越美国的单边秩序,并在合作中宣传、使用现有机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逐渐消除《公约》秩序的机制盲区,赋以更多经济、文化与公共外交功能。比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海上丝

绸之路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与《公约》海上秩序的维护与升级相结合,使各国实际利益与《公约》秩序相捆绑,使单边秩序失去民意与舆论基础,增加其破坏《公约》秩序的外交成本。同时,要在地区危机与灾难中充分发挥救援作用,争取周边海洋国家的深刻信任,与美国单纯追求本国利益而不惜制造与扩大危机的行为方式形成对比,在实践中逐渐实现中国的威信、安全、利益、机制构建能力的同步增长,推动地区的合作共赢。

四、结语

“中国周边海洋外交”是战略机遇期内应时而动的产物。无论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海洋地位还是将战略重心完全转移到陆地方向,都是对现阶段中国战略实力与战略目标的误判。无论周边国家与非周边国家的对华战略如何改变,中国都需要稳定地执行战略机遇期内独立的战略意志,用恒久的耐心与软硬兼备的手段维持周边安全、促进地区合作,以维护海洋主权为契机,将不同的战略层级系统化连接。同时,以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内中国近海为特定区域,对于区域内有冲突小国、区域内无冲突小国、区域内有冲突大国、区域外涉入大国、区域外无冲突周边国家等不同对象采取逻辑统一但手段多样的外交战略。

现阶段,“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对于维护海洋主权而言,既是范畴,也是方式。通过对固有海洋外交记忆“去认知错觉”,对解决直接主权冲突“去极端选项”,对本地区战略环境“去地区主导”的战略流程,逐渐实现对“中国周边海洋外交”三道枷锁的解除,中国海洋主权维护将会出现新的战略局面与实践契机,而中国周边外交也会出现有利于中国实现多边外交与和平发展的整体趋势。这个过程,对于中国的战略定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将促使中国海洋战略乃至整体对外战略更加具体与明晰。笔者认为,“中国周边海洋外交”将在“增压”的前提下,从“止损”到“增益”,在与不同对象的混合博弈中更为积极主动地为和平崛起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 [1] 季晓丹,王唯. 美国海洋安全战略:历史演变及发展特点[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1(2): 71-78.
- [2] 金永明.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论纲[N/OL]. 2015-04-14[2017-04-13] <http://news.163.com/15/0414/10/AN5GPC9N00014AED.html>.
- [3] 习近平外交战略新特点[N/OL]. 2014-03-20[2017-04-13]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20/c1001-24688444.html>.
- [4] 习近平谈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N/OL]. 2014-08-07[2017-04-13]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807/c164113-25423216.html>.
- [5] 祁怀高,石源华. 中国的周边安全挑战与大周边外交战略[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3(6).

(下转第29页)

- [11] 王毅. 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王毅外长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EB/OL]. 2013-09-21[2016-03-02]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78765.shtml.
- [12] 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N/OL]. 2015-05-23[2016-03-03]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3/c_1115384356.htm.
- [13]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OL]. 2014-11-29[2016-03-04]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 [14] 杨成绪. 中国周边外交新格局[N]. 浙江日报, 2015-04-27(7).

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President Xi Jinping's Diplomatic Strategies

WANG Sheng-pe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 Jinping, in overview of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ha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major diplomatic activities smoothly centering on China's overall diplomatic strategies, and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ideas, new policies and new initiatives on the prospect of China's diplomacy. Following President Xi Jinping's footprints and analyzing his speeches in diplomacy, we discover some new features of Xi-styled Diplomacy: more active, more confident, more open-minded, more inclusive, closer to the mass, more pragmatic and more responsibl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 into these new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y help us understand his new concepts and ideas in this field as well as the new moves in China's diplomacy.

Key words: Xi Jinping; Diplomatic Strategy; New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李志鹏]

(上接第18页)

- [6] Michael D. Swaine. Chinese Views and Commentary on Periphery Diplomacy[J].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2014(44):14.
- [7] 牟文富. 美国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外塑造海洋秩序的战略[J]. 中国海洋法学评论, 2014(2).
- [8] 吴昊. 美国战略思维中的“使命观”[J]. 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8(2):86.
- [9] 秦亚青. 关系与过程: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6):86.
- [10] 王帆. 美国的东亚政策[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6):18.
- [11] 宫玉振. 中国战略文化解析[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2:109.
- [12] 陈跃, 马千里. 新变局、新内涵、新常态——中国周边外交新战略探析[J]. 理论探索, 2015(6):61.
- [13] Michael Yahuda. China's Recent Relations with Maritime Neighbours[J].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2012, 47(2):31.
- [14] 梁凯音. 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9(3):110.

The Analysis of China's Periphery Maritime Diplomacy

ZHANG Yi-fe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stitute,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As China's periphery diplomacy develops more and more maritime-led,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clarify the core concept and issue of its maritime strategy. The concept of Periphery Maritime Diplomacy of China is a projection of China's periphery diplomacy toward its maritime strategy. From a medium view, the Periphery Maritime Diplomacy of China connects China's sea sovereignty maintenance which is a micro problem with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which is a macro plan. In the implementation the Periphery Maritime Diplomacy of China, China would confront three chains out the sea which consist of the conflicting offshore countries, the unilateral maritime order maintai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 cliché historical memory of its maritime diplomacy. Logically, China could unlock itself by erasing misperception, extreme options and blind areas of maritime institution. Those measures may help China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its sea sovereignty maintenance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a; Sea Sovereignty Maintenance; Peripheral Maritime Diplomacy; Chains; Unlocking

[责任编辑:梁立峥]